

主编 马明达

暨南史學

第七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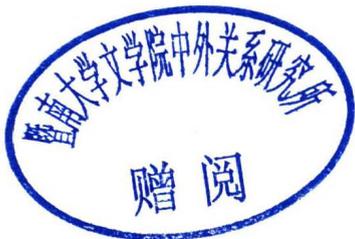


暨南史學

JINAN SHI XUE

第七輯

主編 馬明達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暨南史学. 第7辑 / 马明达主编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495-1650-6

I. 暨… II. 马… III. 中国历史—文集
IV. 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801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张: 40.5 字数: 800 千字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~2 000 册 定价: 8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指导委员会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卫思韩 (美国)	韦庆远 (北京)	朴元熿 (韩国)
西田龙雄 (日本)	朱维铮 (上海)	克恰诺夫 (俄罗斯)
张 磊 (广东)	陈学霖 (美国)	陈高华 (北京)
陈得芝 (江苏)	季塔连科 (俄罗斯)	饶宗颐 (香港)
姜伯勤 (广东)	徐 泓 (台湾)	黄一农 (台湾)
黄时鉴 (浙江)	萧启庆 (台湾)	萨安东 (葡萄牙)
章开沅 (湖北)	普塔克 (德国)	谢和耐 (法国)
蔡鸿生 (广东)		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 马明达

副 主 编 范立舟

特邀编委 金国平 (葡萄牙) 韩琦 (北京) 崔丕 (上海)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明达 马建春 王元林 刘正刚 刘增合
纪宗安 张其凡 张晓辉 陈伟明 陈奕平
范立舟 郭声波 冀满红

编 辑 室

主 任 马建春

执行编辑 刘永连 李新华

目 录

博雅学者 谦德君子 王贵忱/1

朱公风范长存 蔡鸿生/3

师恩深重 心铭长存 丘进 纪宗安 袁丁 张应龙/5

细微之处呈风范

——忆朱杰勤先生执教,观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 丘进/8

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

——缅怀当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奠基人朱杰勤 王介南/12

大师风范 舐犊深情

——朱杰勤先生提携后辈拓展中西交通史研究之贡献 孙光圻/19

“国际视野下的中西交通史研究”学术研讨会暨《朱杰勤文集》首发式纪要 李俊杰

纪宗安/22

中古波斯文残片 S 52 译释——摩尼教《大力士经》研究 马小鹤/26

福建晋江霞浦两地明教史迹之比较 粘良图/43

广州伊斯兰教史三题 马明达/53

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 陆芸/76

苏非东渐与中国伊斯兰

——从《经学系传谱》再论伊斯兰影响宋明儒学的可能性 长谷部茂/84

伊本·白图泰东游与海文化 李光斌/92

古代东北亚航路的形成 汪义正/106

- 神灵的庇佑:郑和下西洋中的祭祀神灵研究 王元林/120
- 郑和下西洋阿拉伯海航线考 周运中/132
- 俄使佩特林首访明代中国初探 张 箭/147
- 明代对日赏赐考 吴 元/162
- 从妇女装饰“花子”看高句丽文化的中原化 徐 晶/172
- 明末赴朝山东移民王以文及其后裔研究 刘冉冉/178
- 马礼逊汉语教学活动述论 谭树林/189
- 从吧城唐番通婚看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
——以吧城华人公馆档案资料为基础 刘永连/220
- 20世纪30年代前后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德育事业特点 郑利群/245
- 再论贡、助、彻——《孟子》的理想与现实 卢中阳 赵世超/253
- 论史华慈解《老》的特点 吴雪萌/261
- 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 殷 慧 肖永明/269
- 顾炎武与清代学术之转向 董 平/299
- 晚清今文经学与墨学 张永春/328
- 中国近世思想史方法论 何 俊/343
-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方光华 兰梁斌/368
- 北齐文林馆考 黄寿成/385
- 唐朝岭南道桂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 郭声波 胡雅琳/397
- 北宋军队拣选制度研究 游彪 张国英/432
- 宋代救荒仓储制度的发展与变化 李华瑞/497
- 南宋桥梁数量、类型与造桥技术述略 葛金芳/532
- 南宋杭州西湖梅花名胜考 鲁 茜/569
- 辽上京地区出土的古代东北亚民族古玺印的新资料 内蒙古辽上京博物馆 暨南
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/580
- 明末北京米氏三园考述 马建春 曹娜/606

博雅学者 谦德君子

王贵忱

顺德朱杰勤先生去世已经二十载了，作为暨南大学的一代学术名师，近期，暨大将有纪念之举，并组织力量汲汲搜集、整理先生的著述，编为多卷本的《朱杰勤文集》，在纪念活动期间正式发行。主其事者是朱先生的高足弟子纪宗安教授。因我与先生相识有年，谊兼师友，故纪教授枉驾敝庐，谆谆嘱序于我。我虽然年衰病积，亦不能不勉而从命，追忆一二往事，略寄高山景行之怀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因为搜求不同版本的龚定盦文集，与朱先生邂逅于文德路古书店，不想一谈订交，惓惓如故旧相遇。此后，我们以龚定盦的道德文章为主要话题，或交流资料，或信函往还，彼此以学术相涵泳。朱先生长我近二十年，降屈齿德，时相过从，使我在理趣积渐中得到很多愉悦，在那个学术环境一片萧索的年月里，这是一份非常难得的享受，现在想起来，犹觉难以忘怀。朱先生以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名世，著作宏富，允称宗师；同时又长于美术史和诗文鉴赏，还是国内龚定盦研究的先行者。早在1940年就有《龚定盦研究》一书，后来又有《龚定盦年谱》等。相比于朱先生来，我于“龚学”起步甚晚，知识有限，承蒙先生厚情高谊，对我不但多有鼓励，而且还曾提议将我们已发和未发的文章汇集起来，编成一部《龚定盦研究资料》，用便学者，亦有助于“龚学”的推动。我们约定，为方便资料的集中和校刊，次年之春，朱先生将暂时移榻寒舍，以企克期竣事。为此，我做了一些准备，深切祈盼着樽酒论文的人生之乐。可惜的是，春节后不久先生竟一病不起，《资料》之约遂成吾二人永远无法实现的心愿。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提到，晚年曾撰有长篇论文《龚自珍师友记》，但此文未见发表，近闻《文集》中也未收录，似手稿去向不明，令人怅然。

朱先生是当代博雅宏瞻的学术大家。平生博览群籍，于书无所不读，又能学兼中西，融通文史，故视野宏远，眼光敏锐，往往于人所不经意处有独到见地，时多创见。先生早岁身逢世变，转徙颠簸，学业多艰，心宇沉沉，常怀忧国忧民之慨，寻求经世致用的学术路径。所以对近代以来的外交关系、边疆纠葛、华侨问题尤多用心。晚岁幸逢世道安定，百

废俱兴,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,先生虽然为足疾所困扰——“行百余步就双腿沉痛,稍息才能继续前行,甚以为苦”,但他博观约取,厚积薄发,继续在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的研究上鼓勇而进,探赜索隐,钩深致远,为暨南大学树植学科特色和优势奠定了基础,做出了世所共誉的贡献。更可喜者,他还带出了一批博士生,如今多数已是卓有建树的学科带头人,在国内外享有“朱门弟子”的佳声。

先生的文集即将问世,我感到非常高兴,不独为先生高兴,也为岭南学术高兴,为整个中国的学术高兴。朱先生以卓萃的学术成就受人敬重,但我以为更重要的,他是一位坚守学者道德立场的学者,一生诚恳待人,努力奖掖后进,与人交往,始终保持谦谦君子的风度,谈古讲今,知人论世,平平然若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,的确让人有“博我以文,约我以礼,欲罢不能”的感受。《易》云:“谦亨,君子有终。”朱先生正是以谦德鸣世的君子,故能得其终也。

悠悠我思,不尽欲言。谨为序。

庚寅仲秋于可居室

朱公风范长存

蔡鸿生

朱杰勤先生的学术生涯，穿越 20 世纪的风风雨雨，与时俱进，终于从早慧走向辉煌。30 年代初，正当弱冠之年，他在学术上已崭露头角，被前辈视为后起之秀。50 年代中期，我有幸在中山大学初沾教泽，他风华正茂，可亲可敬，在后辈心目中，成为德学双馨的“朱公”，享誉康乐园。

朱先生长我二十岁，既是师长，又属父辈，堪称不折不扣的“师父”。我虽然听过朱先生的课，读过朱先生的书，但不足以论朱先生之学。力所能及的，只是整合追忆的碎片，连缀成文，浮浅地再现“朱公”具有平民本色的风范，为《朱杰勤文集》传世点燃崇敬的香烛。

朱杰勤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，故乡顺德，一片沃土，既是鱼米之乡，又是文化之乡。晚清以降，这里人才辈出，推动过珠三角的社会转型和知识转型。记得 70 年代末，有一次与朱先生茶余闲谈，涉及近代岭南的学人学事。我一知半解地说：“顺德真了不起，前有梁廷枏、李文田，后有岑仲勉和您朱公，足以构成一个顺德学派。”朱先生对开宗立派毫不热衷，只是淡淡地回应：“你是外地人，也许可以这样看。我是顺德人，怎么派得起来呢！”言学而不言派，其实就是学界中的正派。

敢于开拓，敢于创新，是朱先生的学术风格的鲜明特色。30 年代初，陈寅恪先生在《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》一文中慨叹过：“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展，犹邈不可期。”当年刚刚跨入历史学门槛的朱先生，知难而进，独立闯关，经历几年的奋力潜研，便写成《秦汉美术史》，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时年仅 23 岁。翌年，即应中山大学之聘，主讲中国艺术史课程。朱先生的少作及其艺术史的教学实践，似乎已被他在华侨史、东南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成就所掩，渐渐从后人的记忆中淡化了。其实，他那种虎虎有生气的求索精神，是难能可贵的，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。

“近来时世轻前辈”（刘禹锡句）和“我生爱前辈”（龚自珍句），七言加五言，概括了学术传承中两种对立的态度。朱先生“爱前辈”是一贯的，虔诚的，身体力行的。1946 年，

著名学者冯承钧死于肾脏炎，身后萧条，遗孤待养。朱先生于闻耗之后，即撰写了情文并茂的《纪念冯承钧先生》，并附长达千言的悼诗，内云：“我与君无一面缘，一在岭南一朔北，造诣悬殊所学同，每读君书心莫逆。”朱公悼冯，堪称佳话。我在这里旧事重提，意在表明：敬畏感并非自卑感，对“传灯”是利无害的。是耶非耶，让年轻人自行识别吧。

朱先生文如其人，人如其名，是一位又“杰”又“勤”的长者。他学兼文史，能诗能文，能著能译。对传统的“国学”和西洋的“汉学”，都有湛深造诣。古籍洋书，并列案头，手不释卷，每当涉及中西互证，便能左右逢源。抗战期间，曾有诗云：“汉学方家戴宏达，郑和知己伯希和。战时朴学殊荒落，珍籍流传海外多。”既如数家珍，又深致感慨。他惯于坐冷板凳，耐得住烦，曾将德国汉学家夏德的名著《中国与罗马东部》用文言文和语体文各译一遍，反复推敲，三易其稿，并冠上古典化的书名：《大秦国全录》。这种于无味中求真味的硬功夫，一般人是愿为也不能为的。

“读书先识字”，是中国读书人的基本功。韩愈首倡于前，顾炎武重申于后。陈寅恪先生曾戏称：“《说文解字》就是咬文嚼字。”不咬不嚼，囫囵吞枣，意味着“小学”之功的缺失。朱先生讲华侨史，就是从“侨”字的本义和衍义开始。谈海外交通史，也分析过“舶”字在古代字书中的演变。这是完全必要的，字源与史源并重，不可偏废。一字之差，有时会误了大事。记得70年代末，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，当时朱先生在中山大学兼任导师，收到外省一位报考者的来函，信尾落款的“呈”字写成了“逞”字，他火眼金睛，完全排除“笔误”的可能性，斩钉截铁地对我说：“一叶知秋，露出了底，这样的文化程度是不能招收的。”这段令人咋舌的朱公“掌故”，似乎至今还有现实意义。

纪念朱先生，学习朱先生，朱公风范长存。

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

师恩深重 心铭长存

丘进 纪宗安 袁丁 张应龙

每一年的5月9日,在我们心中都是一个思绪萦绕的日子,因为那是我们的恩师、我国著名的中外关系史、华侨史专家朱杰勤教授的祭日。20年过去了,我们一直沉浸在浩瀚无际的怀念之中,寸草春晖,师恩罔报,每念及此,深为戚然。兹逢暨南大学和中国海交史学会联合举办“国际视野下的中西交通史研究——暨《朱杰勤文集》首发式”,先生的文集终于得以成功编辑印行,这是我们筹谋已久而终于得以实现的愿望,是我们这些弟子们在恩师的灵位前献上的一瓣心香。

二十年前的4月30日深夜,剧烈的心绞痛使朱老师彻夜未眠,为了不打扰医生,老师竟一直挨到天明。从来都不愿意进医院的朱老师,这次是被救护车接走的,而这一去就永未再返。

5月2日,我们几个在校的弟子得知老师入院,赶快去医院探望。还没进入病房,就被主治医生挡住,医生叮嘱:朱老师患心梗,病情危重,不要多和他讲话,不能多逗留。而我们在病房门口一露面,正在输液的朱老师就高兴地招呼我们过去,一脸轻松地说:“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,这里太吵。我过两天就回去了,你们再不要来了,叫别的同学也别来。”我们诺诺,不敢久留,心里默默祝愿老师早日康复出院。然而,没想到这竟是永诀。

5月9日中午一时许,忽然传来老师病势转危的消息,我们从各自的宿舍向医院奔去。到了病房,眼前的情景让我们顿时为之愕然!只见医生护士们急匆匆地来往于病床间,隔着玻璃看见手持器械的医生正在为老师做心脏电击,每击一下,仪器上随之出现短暂的微波,接着就是一条直线……恩师的女儿不忍看下去,泣声叫停了抢救。一张白布单盖住了恩师,他老人家就此撒手人寰,飘飘然离我们而去。老师走得如此突然,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心意迷茫,总不能相信这是真的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学术繁荣,也出于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传统,朱老师以七旬高龄,积极倡导和创立了一门综合性的历史学学科——中外关系史,并且在工作繁忙又体衰多病的情况下,毅然挑起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重担。从1985

年起,老师分两批招收了7名博士生,开创暨南大学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基业。对暨大而言,博士生的培养是前所未有的事,又是在校学生的最高层次,无论教学和管理都缺乏经验,都需要认真探索,以利教学相长。朱老师不但是治学严谨、声望卓著的学界前辈,而且还是一个一向严于律己的老党员,一言一行,莫不高峻周正,令人肃然起敬。但他的内心世界非常宽厚,待人接物非常谦和,正所谓“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听其言也厉”。他的言谈举止让我们感受到了名副其实的大家风范。

朱老师对所有学生莫不倾尽腹笥,悉心传道授业,使学生们常有曲径通幽、春风化雨之感。他非常注重品德教育,注重专业信心的树植,让大家无舍寸阴,潜心研读,奋力精进。记得在入学后的第一堂课上,朱老师从自己新旧时代的经历对比谈起,教导我们要热爱祖国,热爱人民,一定要树立远大的抱负和志向,脚踏实地,刻苦攻读,懂得“学而后知不足”的道理。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:“读书不是苦事嘛,当你学有收益时,就会感到其乐无穷。”

朱老师非常重视基本功的训练。首先强调要学好外语,这是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步功夫,外语过不了关,就谈不上高水平的研究。老师多次在课堂上将自己多年来的学习心得和方法归纳为若干条,一一讲给我们;还将如何解决问题的各种学术方法演示给我们,条分缕析,深入浅出,让我们大受教益。朱老师是淹贯宏通的学者,一生治学,力主博通广识而由博返约,他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贮备,就难有专精的成就。故一定对相关学科多所涉猎,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修养,只有如此,才能多角度、全层位地看待问题、发现问题,达到左右逢源、触类旁通的学术境界。他时常以清初学者顾、黄、王、阎等为例证,讲这些学者的治学风格和王国维所谓“国初之学大”的精义,讲到高兴时,总会大段引诵他们的诗文,显露出老人家博闻强记的深厚功力。

朱老师自幼家境并不富裕,但他聪颖好学,青少年时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底,并且精通英文。1933年夏,以自学成才的“学历”被中山大学破格录取为史学研究生。此后,他徜徉在广阔的史学领域里,勤奋学习,亦勤于笔耕砚耘,陆续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,先后出版数十部专著。研究领域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方面,受到学界高度评价,终成一代史学名家。

朱老师非常重视学术实践的意义,主张在科研实践中提高学力,逐步养成集腋成裘和发微阐幽的治学本领。在追随朱老师问学的三年间,老师不但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识一点一滴传授给我们,还尽量为我们提供科研实践的机会,让我们参加他主编的《中外关系史丛书》和《中外关系史辞典》的撰写工作;并从有限的教学经费中抽出一部分,编辑出版了一期《中外关系史研究集刊》,以使大家为撰写学位论文做些前期准备。

撰写学位论文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选题,朱老师主张选题宜早不宜迟,早定题早做资料准备,一是可以从容撰稿,二是选题不当可来得及调整。入学不久,他就提醒大家,一定要广泛注意本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,及国内外的研究信息,并要大家互相交流信息,

养成“兼善”和“济人”的学术心态。还要求大家要密切关注现实,力争达到古为今用和有益于学科建设,有益于填补空白。经过第一学年的反复斟酌,选题基本确定,老师便放手让我们带着问题去看书去思考,提出题目设想,再与老师交谈,由老师审定,最后组织集体开题,确定论文题目。

三年中,每周一次的课堂授业和学术沙龙,都是安排在老师家里进行的,每逢上课前,老师总要提前备水沏茶,做好各项准备,就连讲课用的小黑板也要自己抢着拿进拿出,擦拭得干干净净。以老师的年事之高和学术声望之隆,许多事都可以由助手和学生代劳,学问上也不必过于细致,然而朱老师不但事必躬亲,而且总是要做到尽善尽美,然后才能心安理得。

我们同窗的七篇论文,时间上从远古到近代;地域上从非洲、西域到朝鲜、日本;内容则从历史人物、华侨华人到文化、国策研究等。面对如此广博而繁杂的论文选题,朱老师与他所倚重的芦苇教授一起,经常研究工作,协调分工和进度,对每个博士生的资料搜集、观点形成、章节厘定、文章撰写等,莫不给予细心指导。他不断拿出自己珍藏的书籍给我们使用,在大家外出查阅资料时,又写信给各地的学界友人,使我们能广识博闻,得到多方面的帮助。七篇论文的初稿都如期提交了,但朱老师却在此时染上眼疾,视力减退,看稿非常吃力。他却全然不顾忌这些,竟兴致勃勃地不分昼夜,一篇篇仔细审阅。他审读很严很细,将论文中的缺漏、错误、疑点一一指出,甚至连错别字、病句、标点也不放过。同时他还亲自动笔改动,他的许多精辟见解和珍贵史料融入各篇论文之中,如同画龙点睛,提高了论文质量。七篇论文逾百万言,这需要倾注多少时间和精力?当我们自己也担当博导工作后,反躬自思,才真正感受到当年朱老师用力之勤,用心之细,也真正感受到师恩浩荡,令人终生难以忘怀!

1988年,老师培养的第一批博士、也是暨南大学创办以来的第一批博士顺利毕业。送出七位博士,老师又招进一名在职博士。而此时他老人家已出现过几次心绞痛,加上腿病愈来愈重,行动已经相当吃力。但他不以为意,仍然坚持每周上课,亲自为博士选择论文题目,不断与学界的新朋旧友谈诗论文,并且还思考着新的学术计划。从发病到离开我们,只有短短的九天,当弥留之际,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我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呀!”听之者无不为之动容。

二十年后的今天,我们手捧着五卷本的《朱杰勤文集》,以无尽的感恩之情肃立在老师的遗像前,默默地回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,回忆老师的殷殷教诲,一切如在眼前。稍能告慰老师的是,我们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苦心栽培,大家都在继承和发扬老师一生为之不懈推动的学术事业,在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上矻矻不歇,努力求取学术上的进步,以各自的成绩报答师恩于万一。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

细微之处呈风范

——忆朱杰勤先生执教,观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

丘 进

此次来穗参加朱杰勤先生文集发行仪式及学术研讨会,对我十分重要,因为通过与各位师长、学友相聚,互相交流,回顾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为人风范,得以清理自己的心路历程,发现此生各方面的差距,重树目标,藉以回报先生多年的殷殷教诲。

我自1982年起,师从朱杰勤先生8年,从先生宏观大略的指导,到日常生活的关心,直接地、全方位地感受了学术大师的风范,这样的大师风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。为了此次会议,几天来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回到朱先生的身边,在平实的追忆中,也力图对“国际视野下的中西交通史研究”这一主题做些思考,产生了个人的一点想法。表述出来,一是与大家分享先生的音容,二是就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中的相关问题做些反思。

首先是学术研究离不开兴趣和机遇。

从朱杰勤先生入门史学的过程来看,当时一位意气风发、聪明机灵,但没有受过完整中学教育的青年,能够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,几乎是偶然的,甚至是随缘的。他青少年时代接受了多方面的传统文化教育,虽非在正规中学学习,但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。据他所说,当年是出于生计,向往中山大学每月80大洋的津贴而报考研究生,提交了一份洋洋8万字的《中国史学研究》,获得校方特准报名。入学考试,他并未就《史汉优劣论》这一题目做太多的常规性铺陈,而是发挥他的史学功底,用一手漂亮的骈文,表达了他的思想和学识,深获朱希祖先生的赏识,中山大学予以破格录取。

这使我想,如果当时的中大研究生录取采取当今的办法——当然可能更为严谨,招收到一些传统的学生——那将会失去一位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师。所以,在研究生(尤其是博士生)的招收方面,当年中山大学的做法,实在有着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。我们当然要遵循有关的招生规章制度,但也不能不考虑在特殊机遇下选拔特殊人才的重要性。

其次,对于研究生的学习来说,导师既要课堂教学的耳提面命,更要有学术思想的高屋建瓴。

对于文史学科研究生的培养,特别应该注意传授经典的学术信息,直接或间接地向学生引荐大师和名家,让学生尽量地接触、吸纳大师们的学术成就,传承他们的治学方法。在这方面,老一辈学者的教学方式值得我们认真仿效。

我们看看前两辈朱先生的做法。朱希祖先生学识渊博,尤擅南明史研究,但他并未要求作为弟子的杰勤跟他一起治南明史,而是要杰勤先生循序阅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等经典史籍,以自学为主,在学习、研究中观察学生之所长,导师的研究变成了学生的学术背景,给学生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学术天地。杰勤先生经常引借龚定庵诗云:“从来才大人,面目不专一。”大概他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学习、研究,并教育自己后辈的。

我是朱杰勤先生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,1982年入学。第一次上课,是在先生家中。先生在最初的几次上课中,介绍了他的学术生涯,给我指出了学习的方法。我以前习惯于老师在堂上口若悬河地宣讲,突然变成在导师家中座谈式的上课,感到十分新鲜。其实,在他那轻松平实的聊天中,包含了大量的知识信息,例如:他说到朱希祖先生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,曾和沈雁冰、郑振铎、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文学社,提出许多文字改革、音韵改革的方案,对中国文字和拼音的改革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。朱希祖主持北大史学系时,把课程分为六大系:(1)史学基本课程;(2)史学辅助课程;(3)史学史及史学原理;(4)中外通史及断代史;(5)专门史;(6)第一、第二外国语。后来我想,朱杰勤先生精湛的语言功底、对外语的高度重视、对外国史的深入研究、对史学史的理论的建树,以及他教授学生的方法,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朱希祖先生的衣钵和习性。

希祖先生是浙江海盐人,杰勤先生说希祖先生上课时地方口音很重,听起来颇为吃力。这一点也似乎无意地被杰勤先生继承了下来,杰勤先生是顺德人,顺德口音也很重,不过我想应该比我们的太师爷希祖先生要好得多,因为我们听起来不是那么吃力,杰勤先生讲话发音洪亮,语速较慢,吐字清晰,我从他那儿学到了不少正宗的广东话。这也证明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。

朱先生的讲课中,不时地回忆当年他和许多著名史学家、教育家、科学家的交往情况,如翦伯赞、范文澜、吴宓、熊庆来等。他经常谈及在重庆南洋研究所和姚楠先生的共事,十分亲切,给我的印象极深,以至后来我和姚楠先生经常联系,受益匪浅。后来还与姚楠先生合作写了一部书——《七海扬帆》。

朱先生还告诉我,他每次去北京开会,季羨林先生都要去看他,请到家中吃饭,分手时季先生一定会送得很远。1996年,季先生到暨大参加一个活动,我也在场,和季先生谈到此事,季先生说他和朱先生交往甚密,十分敬佩朱先生的学问。

我感到,朱先生平常与学生的谈话,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面的教育,他的一言一语,不经意中提到的某位学者、某个著作、某个事件,都包含着有价值的信息,或者说,从他口中说出来,比学生从其他地方看到、听到,不但更亲切,而且分量重,对学生的影响自然也

深得多。

第三,导师带学生,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个性。

前辈两位朱先生的教学似乎也是一脉相承的。朱希祖不曾把杰勤当做助手来从事什么科研课题或参与写书,而是根据学生的特点,让杰勤先生重点研修秦汉史,走出自己的学术路子。杰勤先生研读秦汉史独辟蹊径,写出《秦汉美术史》,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慧眼识货,立即出版,为中国美术史奠下一块重要基石。此后,杰勤先生一发不可遏止,在涉及史学、文学的许多方面发表了大量开拓性的著述,却少有南明史的内容。朱杰勤先生对他招收的几个研究生,也十分注意发挥每个学生的特点,而不是用自己的框架去约束学生。他在带我们的期间,也在撰写许多重要的著作,例如整编《中外关系史论文集》、修订《亚洲各国史》,撰写《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》、《中外关系史译丛》、《英诗采译》等,还撰写许多文章,但他从来没有要学生帮他做过任何收集资料、制作卡片、抄写文稿之类的杂事。他自己勤奋工作,笔耕不辍,本身就是一种无声而有力的教育,我们除了像老师那样去对待学问,没有别的选择,更不能偷懒、取巧。

朱先生对学生的学术研究主张厚积薄发。我在读研的后期,也尝试着写学术论文,初稿拿给朱先生审阅,他一般只是看个大意,或许会指出几个小毛病,绝不会大砍大杀,痛批一通。记得我写过一篇有关汉代西域陆路交通的长文,发表在《新疆社会科学》上,朱先生看了很高兴,鼓励我说:你在广州从事西域历史研究,写出的文章能够在新疆最权威的刊物发表,很不简单。

从朱先生教学的风格来看,导师带研究生,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生,更重要的是打好基础,授以传统,晓以理念,传以经验,从导师的治学过程和学术思想中渐渐吸取精髓,找到方向,学习方法,开拓思路,而不是过多、过早地限制他们,更不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帮手,让他们从事与其后的研究关系不大的事情。

此外,朱先生还经常将他做学问的方法介绍给我们。有一次,他说想搞一个专题项目的研究,这需要在浩瀚古籍中搜寻特定的资料,那时没有电脑,都要靠坐在图书馆查找资料、登录卡片,那样的工程量就太大了。他说有个诀窍,会使这项工作变得很容易,可惜后来没有来得及实施,那个诀窍是什么,我一直没有学到。

朱先生的文字功底极好,他写的文章,一看就知道出自他手。他告诉我们,中文写作要注意精炼,一般来说,每句话不要超过9个字。这对于我们来说,实在是太难了,但我一直记得他的这个教导,自己写文章时,尽量做到简洁。

朱先生不主张死记硬背。有一次,他说到历史系一位年轻老师在做学术报告时,几乎大段大段地背诵文章资料,他感到吃惊,认为这不是做学问的好办法。

每个周二下午,我们几个研究生到先生家去上课,那一天也是我们精神最为愉悦的时刻,因为每次我们都有收获,有长进。

第四,导师应该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学生,把学生推到学术的第一线,接受锻炼。

朱先生在教学中经常提到中山大学的几位专家,如梁方仲、岑仲勉等老一辈名师,把他们的著作推介给我们。他还经常请来蔡鸿生、姜伯勤等教授,指导我们研究,并安排暨大历史系的唐森、卢苇、梁作楦、徐善福等教授参与研究生的培养。

1983年春,朱先生带我们列席泉州会议,我们认识了庄为玠、韩振华、罗荣渠、田汝康、虞愚等先生,北大的陈炎、陈玉龙教授还专门给我们做过讲座。1983年,中国社科院在新疆召开中亚史学会,朱先生是主持人,他把我带去参加会议。当时研究生的经费有限,但朱先生破例让我跟他乘坐飞机前往新疆。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进入中西交通史学研究崭新的学术殿堂,我认识了马雍、章巽、陈高华、梁从诫等著名专家,还有刘迎胜、黄靖、马晓鹤、于化民等大师们的高足,使我终身受益。后来,几乎每年这样的会议,朱先生都会带研究生参加。之后,我们随朱先生参加了1985年长岛会议,以及南京会议等,认识了陈碧笙、贾兰坡等大师,获得了极佳的学习、锻炼机会。

朱先生与全国各地的专家、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,其中不仅有名家、教授,也有许多刚入门的青年学生。只要给他去信,他都亲笔回复,如果登门请教,他都热情接待。当时暨大历史系助教何思兵,希望听朱先生的课,朱先生不但允许,而且每每对他悉心指点,不断提携。这几位非在编的研究生,后来都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专家。

朱先生还组织我们几个研究生自己编写学术刊物,拿出科研经费,出版了一本《中外关系史论文集》,这对我们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是一次极好的锻炼。

第五,作为学科带头人,要站在整个学科的高度上从事研究工作,要更多地关注学科长远发展的大问题。

朱先生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会长,在某种程度上,他是这个学科发展的总指挥,在他眼中,学科建设没有校际的隔阂,也没有省市、区域的界限,甚至不应有国家的限制。对于中西交通史、中外关系史的学科建设,他不仅从宏观上提出规划和前瞻,而且往往有比较具体的方案,利用一切机会,大力推动学术发展。对整个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事情,他都亲自过问,详细部署。在他的文集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各地学者的许多通信,十分宏观、大气,几乎每一篇都标志着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。

朱先生对于学科发展往往有自己独特的看法。比如,他不太赞成对某一类人群做过多的专门研究。当时学术界有些人十分热衷搞“客家学”,他觉得客家可以研究,但搞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则必要性不大。朱先生是国内华侨史研究的发起人,并亲任暨大华侨所所长,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但他后来对华侨史研究的前景有更深的考虑,他认为如果只就华侨论华侨,就会太狭窄,研究就会受限。这是值得我们在今后相关研究中思考的。